



采访者: 邢校长, 您好! 您是马克思主义名师大家,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。请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, 谈谈自己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?

邢贲思: 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经历, 我原来是学外文的。1946年我16岁, 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救国思想的影响, 我大学报考的是农业经济系。1949年5月,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, 特别是新中国外事工作的需要, 中央外事组到华东几个省市招录一批青年干部, 作为新中国的外事干部。1949年7月份外事小组在上海招生, 经过严格考试, 最后录取了我。当时解放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, 需要在华东特别是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分子, 去东南新开辟根据地参加工作, 当时张鼎丞同志号召我们踊跃参加。后来我两个都被选中了, 当时的想法是哪一个先录取就去哪个。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, 只要参加革命队伍我都愿意。结果发榜了, 我后来选择参加北上外文大队。当时中央有规定, 所有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分子, 必须经过华北北大学习, 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。华北北大原来所在地, 就是现在离中央党校很近的西苑机关那里。经过半年学习, 1949年10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 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 成为华北北大第一批团员、党员。

采访者: 那么您从事理论工作的历程是怎样的?

邢贲思: 至于我参加理论工作的历程, 我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理论入门, 主要是指我在俄文专修学校留校当教员的经历。留校后, 学校先是我让我开“新民主主义革命史”的课程。“新民主主义革命史”这门课程在大学时候学过一点, 但是让我讲课, 困难很大。当时邢哲同志就让我们到人民大学去旁听课程, 听何干之 and 胡华老师的课, 回来后再自己编写讲义, 然后去讲。那时候我才22岁, 这样工作了一年多以后, 学校又准备给四年级开哲学课, 我们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, 经济学比较强, 马列主义基础比较强, 革命史后来也比较强, 唯独哲学没有人教, 学校就准备抽几个人开这个课。我们向领导反映没学过, 当时又是学校出面, 跟马列学院联系, 当时达成一个“君子协定”: 学校选派4个人, 2个学经济学, 2个学哲学, 到马列学院学习, 学习毕业后必须回学校。最后我们4个人参加马列学院一部二班的学习。当时一部的主任是胡绳同志,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胡绳同志比较熟, 他既是我们的顶头上司, 又是我们的老师。

第二阶段是打基础, 主要是指在马列学院两年的系统学习经历。在马列学院一部二班两年的学习, 对我帮助特别大。对一个刚刚参加理论工作, 尚未入门的青年教师, 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培训, 提高是比较快的。当时马列学院师资队伍很强, 艾思奇教我们哲学, 郭大力讲经济学, 胡绳讲近代史, 张如心讲中共党史。这么一个阵容。再加上杨献珍也亲自讲课, 他重点讲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, 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专家。马列学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, 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。可以说, 我对理论工作的真正兴趣是在这两年培养起来了, 因为学进去了, 有兴趣了。这两年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,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。党校学习后, 让我们回去教课, 那水平就不一样了。

第三阶段是积累沉淀, 主要是指在哲学所31年的学习提升经历。整整31年, 有几个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特别值得回忆。

一是继续打基础。哲学所要求特别严格, 要求我们先不要着急写文章、写著作, 但是一定要写笔记, 读完一本书一定要写一个几千字的笔记。我写了16本。导师要求也特别严格, 当时我的导师李光灿先生规定我们每天要读50页经典著作, 一个星期谈一次话。导师跟我们对话, 会问我

邢贲思

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2年毕业于中共中央俄文专科学校。历任中共中央俄专、北京俄语学院教师,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学术秘书,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, 《哲学研究》主编。1988年7月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, 1994年4月兼任《求是》杂志社总编辑。现为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、《大百科全书》总编辑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、中国期刊协会名誉会长。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一届理事, 中苏友协理事, 清华大学教授,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长。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, 第八、九届全国人大代表,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。



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引向深入

——邢贲思同志访谈录

► “搞理论研究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, 不能是‘万金油’, 什么都学一点, 没有专业支撑, 搞不好。”

► “写文章绝对不能搞‘中药铺’, 写文章就应该像剥笋壳。笋是一层一层的, 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。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, 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。”

下来让我写《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》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文章, 就是《标准只有一个》, 1000字的文章,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。他的观点是正确的,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发表后收到很多来信, 后来《人民日报》理论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写文章回答这个问题。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背景, 胡福明同志发表的那篇文章, 前前后后我都不知道, 就是凭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解, 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——《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》。这篇文章在6月16日见报的, 在胡福明这篇文章之后。7月份, 吴江同志在《解放军报》又发表了一篇文章。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把这三篇文章合并在一起, 作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期的几篇重要文章。这以后各地各单位就邀请我作报告。之后的1978—1980年我写了差不多30篇文章, 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上。

哲学所还有一个事情要讲一讲, 就是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撰。当时国家要实施一个大工程, 就是要编写大百科全书, 覆盖各个学科, 哲学卷当时交给哲学所。阎明复同志跟我商量, 像哲学卷这样的重头戏肯定要请权威的专家来挂帅, 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请胡绳同志。于是我们两个到胡绳家里请他出山。但是他给我交代一个任务, 要我当常务, 主要的工作由我负责。当时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,

从1982—1986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, 收获很大。当时胡乔木同志要求, 请最合适的专家写最合适的条目。当时没有人推却, 因为都知道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, 很多大专家写出来的五百字都不到的条目, 都反复地修改。有些专家虽然已经高龄, 身体也不好, 为了写短短几百字的条目反复地修改, 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, 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。我记得是孔子的一个条目, 五千个字, 专家换了好几位, 都是著名专家。

第四阶段是专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, 主要是指在中央党校期间研究的转变。1988年7月, 我到中央党校任职, 党校六年(1988—1994年)多的时间对我帮助很大, 最主要一个就是对联系现实问题的研究。党校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, 研究问题的重点是现实问题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、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。我来了以后要适应这样一种环境, 除了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外, 我研究的重点也有了变化了, 重点转向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当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。

以上就是我简单作一个经历的回顾, 共四段: 俄文专修学校、马列学院、哲学所、党校。这四段经历对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讲帮助比较大, 第一段为起步阶段, 第二段叫入门阶段, 第三段是提高阶段, 第四个是总结阶段。

采访者: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, 请您谈谈关于理论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。

邢贲思: 做一个合格的理论工作者, 我感觉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。

第一, 要打好基础。基础一定要打得比较扎实牢靠, 基础不牢, 那就很漂浮, 写文章、教学科研都是很漂的。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, 我两段时间打基础, 一是马列学院系统的学习, 另一个是哲学所30年的锤炼, 30年的磨练提高, 打好基础后才开始研究问题, 做研究。

第二, 要学有专长。就是你要依附在一个专业上面, 因为理论工作的天地那么广阔, 没有一个专业作为你的依附点, 很难做好。从我们的前辈来看, 凡是理论上学术上有成就的老先生和同事, 都有这个特点, 都学有

专长, 比如杨献珍、艾思奇、张如心、郭大力同志等。从我们的同事来看, 跟我们年龄资历差不多的朋友也都是那样, 比如说龚育之同志, 大家都知道他是党史专家, 他还是自然辩证法的专家。这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, 学科上都有着力点, 有学科作为支撑, 功底就比较深厚。还有金冲及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当深厚, 对毛泽东、周恩来传记的研究有很多贡献, 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专家。刘国光同志是经济学专家, 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学习经济学, 全国解放后留苏, 在苏联的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, 是当时经济所的所谓几大“金剛”之一。我为什么说这些呢? 搞理论研究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, 不能是“万金油”, 什么都学一点, 没有专业支撑, 搞不好。

第三, 要经受多种锻炼。从事理论工作, 需要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, 所以参加一些实际工作, 好像跟现在的工作不搭界, 但是对以后的发展相当有帮助。我本人就经受了很多这样的锻炼, 举个例子: 上世纪50年代我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, 1955年被借调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, 即后来的市委大学部, 书记是蒋南翔, 副书记是宋硕。我带五六位同志参加前门区大五金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, 这个经历对我帮助很大, 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体会比一般的学习书本文件体会要深刻。这次改造比较顺利, 我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际工作锻炼, 对党的政策、思想、理论领会得比一般学习要深刻的多。

第四, 要勤奋。这种勤奋不是一般的勤奋, 是要特别的勤奋。我当时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很少有凌晨一点钟以前睡觉的, 年纪轻, 身体也扛得住。我在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上强调过三勤——勤读、勤思、勤写。写是非常重要的, 把你所读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, 把阅读思考的成果用文字表现出来, 这就是写文章的准备。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成果, 最普通的就是写笔记, 你看一篇文章后写笔记, 笔记不是照抄它的内容, 而是在领悟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, 这个好处太大了, 我自己受益很多。我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的, 坚持写笔记, 笔记写得好的, 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。

第五, 要有正确态度。理论工作确实比较重要, 在整个意识形态里理论工作是“管总”“管头”的。对理论工作者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以及政治思想的要求, 比其他领域的人员要求要高。党校对干部、对老师的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, 这是党校的好传统。

采访者: 作为老党校人, 您对党校、对党校的青年教师有哪些希望?

邢贲思: 我在党校工作那么多年, 对党校的感情是很深的, 作为老党校人, 对党校、对年轻的老师, 我也有几点希望:

第一, 对党校的希望。我认为党校现在形势很好, 有中央的关怀重视。中央高度重视党校工作, 人才济济, 团结奋进, 教学科研工作比我们当时要高出一大截, 水平比我们有很大提高。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意, 一是保持好的传统, 不要隔断历史。我最近看了刘云山同志讲党校姓党的讲课稿, 很全面很系统。好的传统一定要继承下来, 重视党性修养, 重视严格要求。二是党校在教学科研中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, 搞理论不能脱离实际。延安时期, 实事求是、理论联系实际, 就是党校的校风, 要继承和发扬。

第二, 对青年教师的希望。这里只强调八个字: 志存高远、脚踏实地。志存高远, 就是说永远不能满足现状, 党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, 力求做到更好, 没有最好。理论工作没有止境, 前辈学者也有缺点和不足,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谈何容易, 我们花一辈子去做都不一定做得好, 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。脚踏实地, 千万不要学习学术明星, 要能板凳坐的十年冷。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做一点事, 出一点成绩, 绝非容易的事情。这要经过多少年的辛苦, 多少年的夜不能寐。学无止境, 一定要踏踏实实她甘于坐冷板凳, 才会有更好的成绩。

(访谈整理: 冯秋婷 陈远章 苏敬联 路也)

